

阳光地帶的

梦

张毓茂 著

郭沫若的性格与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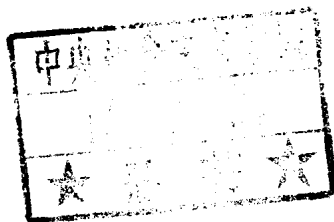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 206.7
27

阳光地带的梦

——郭沫若的性格与风格

张毓茂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60号

责任编辑：马朝阳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马洪林

阳光地带的梦

——郭沫若的性格与风格

张毓茂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52千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600

ISBN 7-303-01945-6/G.1254

定价：（精）14.10元

（平） 7.10元

序 言

高 擎 洲

在郭沫若研究领域，继《文学巨星郭沫若》之后，毓茂同志的又一部著作《阳光地带的梦——郭沫若的性格与风格》行将问世。这无疑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初冬某日，他送来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校样，嘱我作序。尽管我不擅长此道，然对于毓茂，无论于公于私，都只好从命而勉力为之了。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郭沫若是一位富于理想、充满激情、勇敢实践、执着创造的伟大先驱，终生挟时代风雷，为民族和祖国而歌哭，为历史的进步而呐喊，以破坏腐朽、铸造“大我”为己任，开拓着阔大雄奇、奔放豪迈的崭新艺术境界，进而成为在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产生的一代文化巨擘。他留下的伟大精神财富，无疑将极大地影响一代又一代的精神世界，为塑造中华民族之魂发挥重大而独特的作用。因此，在学习、纪念郭沫若的同时，以其文学、学术、政治的互渗、互用为新的基点而进行郭沫若研究，便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了。

恰在此时，我们看到了《阳光地带的梦》。

本书是作者近十余年来有关郭沫若研究成果的结集。经过编

排，分为四辑：文化先驱的性格、《女神》与《天狗》、郭沫若的戏剧与小说、郭沫若的友情。虽不似通常看到的“专著”那样面面俱到，却也联接起一个有着某种内在逻辑意义的系统理体。在书中，作者通过不同的侧面和视角，深入探寻郭沫若那深邃、宏丰、复杂的精神世界及其文学业绩和思想建树。作者似乎并不刻意追求以各种所谓“新”的研究方法进行“郭学”研讨，却是以在一个极为阔大的历史时空和深层次的社会精神结构内，对研究对象做出新的审视而见长，表现出浓烈的文化观念和历史意识。

在学术界，一般把郭沫若研究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二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以来。毓茂是新时期最早进入郭沫若研究领域的一位。早在1978年，他便在《文学评论》发表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试论郭沫若历史剧的“反秦”问题》一文，被学者们认为“澄清了人们心有余悸的郭剧‘反秦’问题”，是郭沫若史剧研究第二阶段结束的标志之一。

（见王瑶、樊骏、赵园等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第1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但依我看，其意义还不仅限于此。它既是郭学史剧研究第二阶段铿锵的尾声，同样又是新时期郭沫若研究的前奏。无论是在政治上或是在学术上，都表现出很高的胆识和极大的气魄。如果说，新时期郭沫若研究于1979年前后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那么，在1992年间则以纪念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为标志，出现了更具规模并寻求更大学术突破的研究态势，掀起了“郭学”研究的又一次浪潮。显然，《阳光地带的梦》，是郭沫若研究这一新的历史突破口上令人瞩目的新成果。

《阳光地带的梦》已经不是单纯文学创作的评析，也不是分门别类的研究。综观四辑论文，它的综合性研究体现出相当的广度和深度。而在方法上，又强调实事求是，讲求科学性，既无溢美之词，又对郭沫若在性格、气质与心理上的弱点毫不掩饰。依我之见，它在如下几方面的主要内容上就表现了这些突出的特征。

其一，文化的人格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郭沫若又这样具体阐释说：“诗——不仅是诗——是人格的表现，人格比较圆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真正诗人的诗，不怕便是吐诉他自己的哀情，抑郁，我们读了，都足以增进我们的人格。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这种冲动接触到我们，对于我们的人格不能不发生影响。”（《沫若文集》第十卷第201-202页）可以见得，思考探索环境影响和制约下的社会生命主体，是作为人学的文学之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是最为重要的方面。以此为出发点，作者在书中深入进行着文化意义上的人格研究。这是由于，作为共同性与特殊性统一而主要突出特殊性即个人规定的人格，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的自身，换言之即谓“人就是人格”。

然而，这项工作又谈何容易！知名的美国文化人格学专家V·巴尔诺就曾感叹道：“在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绝不能忽视解释的作用，但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人格：文化的积淀》第35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作者对郭沫若人格研究的论文，主要集于这本书的第一辑中。在《文化先驱的性格》的总题目下，作者首先对郭沫若一生进行了生活史的分析。他紧紧抓住“主人公对自己所作的陈述以及他的价值与态度，去揭示‘个体的特定价值、态度与观点的形成线索’，探究‘是什么力量塑造了这样一种人格’”（《人格：文化的积淀》第356-357页）。比较全面、系统地对郭沫若的行为模式、社会倾向性、心理状态、自我意识等方面作了详尽、精到的描述。《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时代特点》和《郭沫若的性格与风格》二篇，则紧紧围绕文化变迁与人格重组之间既相对应又相冲突的矛盾关系，对郭沫若在动荡变幻的年代中之人格的构成与发展变化进行考察。前者侧重于就郭沫若对社会环境的态度、行为的意识倾向和积极特征进行专题性审视，后者则

脱离文学研究的樊篱，以更广阔的视野，从政治家的角度切入，从整体性上解析郭沫若的政治品格。作者认为，郭沫若具有政治嗅觉敏锐、勇于政治实践、惊人的政治洞察力的特征，而这些又同其某种程度的偏激性、摇摆性、主观随意性以及文风上虚夸、粗疏、浅露的格调相扭结。由于作者选择了这样一个久不为学界所瞻顾的郭沫若政治家品格结构的论题，又由于依据充分、翔实、贴切的史料论证，和布以纷纭复杂的旧中国各政治集团及其领袖人物相互斗争的阔大背景，使本文确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颇诱人一读。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郭沫若作为中国的歌德，既有其崇高、伟大之处，又未能免除中国的“庸人气味”。无论怎样说，这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中，是顺理成章地应视为一家之说的。

其二，社会与艺术的交往和比较研究。在社会中，“人们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互相交往的”（列宁：《唯物主义是经验批判主义》）。人类之间的交往，犹如人之于阳光空气，不可断缺。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对此深有感触：“直接同别人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了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无法否认，在郭沫若的一生中，社会交往对其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文学艺术家、历史学家等等，无不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因此对于他的交往研究，也便成为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而又确实显得十分重要的课题。作者有意于此，在这方面颇下了一番功夫。当然，作者的研究还远非是系统的全方位的。他仅仅从郭沫若与同时代人的友情和思想交往中选择了堪称对郭影响最大者周恩来、鲁迅、闻一多等三人，做了细密的考察。

《郭沫若与周恩来》，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文学家与政治家结交，在世界上虽不乏其例，然在郭沫若与周恩来之间，却演出了一场人类交谊史上生死不渝、催人泪下的壮剧。在他们的交往中，郭沫若多居于受动者地位。周恩来不仅是他政治上的引路

人,思想上的导师,又是他文学创作、历史研究等方面的良师益友,而且在生活上患难与共,体贴关怀,建立了真挚的友情。作为政治领袖的周恩来,在与郭沫若的长期交往中,表现出社会性与个人性高度完美统一的特征。以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为例。周恩来对郭沫若“用历史题材来兼带着表达并批判当代的任务”(《郭沫若论创作》第511页),响亮地呐喊出抗战时期中国人民团结抗日、要求民主与自由的心声,表现出极大的快慰,力赞:“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而对于《虎符》的创作,周恩来则具体建议说:“我们东方人是赞美母亲的,何不从历史中选一位贤母来写剧本?”郭沫若受此启发,于是便塑造了无历史依据的信陵君之母。这里,周恩来的社会理想人格与个人独特的风格,水乳般地融为一体,进入周、郭的交往中,进而渗入郭沫若的史剧创作领域。由此,形成了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以社会政治选择和现实战斗意识为出发点、充分显示个人气质、志趣的具有独特内涵的交往方式。所有这些,都在著作中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展现。至于郭沫若与鲁迅、闻一多的研究,则另具一番特色。郭与鲁迅,都堪称现在中国文坛上永不息落的巨星。但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所致,个人虽生活在同时代甚或同地区,却终生未曾谋面。郭与闻,则同为现代诗歌大家,相互引为知音。然也毕竟只见过两面。对于终生未曾谋面或晤见罕疏却相互有着深刻的联系、了解和影响的两者,作者在对其交往的记叙与考察中,又揉入了比较的方法进行多侧面的研讨,从而使这种交往研究进入了更为深刻的理论层面。

其三,创作的本体研究。收入在本书第二、三辑中的诸篇,对郭沫若的新诗、小说、戏剧及文学创作理论的研究,无论是从纵向的历史批评的角度揭示作品的独特地位,或是横向的对某一类体裁的综合品评,或是对于文本的本义解读,都多有新见。这种创作的本体研究,显示了一种宏放的气魄,敏捷的政治学和社会

会学目光。作者善于将作品置于社会大文化的辽阔立体天幕上，描摹创作者在文学的天宇中游弋的轨迹，进行着真诚的心灵对话，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例如，郭沫若的创作与泛神论关系，一直是学术界颇具分歧和争论不休的问题。有学者根据郭沫若自相矛盾的说法，提出泛神论思想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国粹”说。对此，作者持有异议，并做了深入的讨论。指出，庄子的“道”与泛神论的“神”有本质的不同。然而，郭沫若把两者混为一谈，则由于它们有表层的相似之处，郭沫若混同了“道”与“实体”的差别，进而把斯宾诺莎所说的人认识“神”和庄子说的人在精神上得“道”视为等同，按照自我主观意志去进行理解和加工改造，因而发生了这种误解。这种解释，无疑具有其合理的内核，是可以为人所接受的。

又如，在文学创作领域，郭沫若是新诗名世。他的小说还多不为研究者所看重。作者在《论郭沫若小说的艺术开创作用》中，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宏观动态考察，指出：郭沫若小说在结构的散文化、叙述视角的多元与变换性、非情节因素的大量融入等方面，表现出可贵的创新精神。他首创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模式，更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又都有力地促进了封建时代文学向新文学过渡的历史进程。这种新的发掘和认识，无疑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毓茂在“阳光地带的梦”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题目下，生动展示了郭沫若对理想人格的探索与追求，奉献出一份颇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然而，一个作家自身的价值决定了对其研究的价值。这就意味着，郭沫若研究的关口还多，路程正长。毓茂的这部著作也难免有可以进一步商榷甚或不当之处。但我只是想说，对于作者而言，当郭沫若研究由专业变成副业时，它不应是其在这一领域中的终极奉献。愿毓茂在别一番“阳光地带下”，再圆郭沫若研究的新“梦”。

急匆匆阅完全书校样，所说未必肯綮切中，遗珍漏珠，在所难免。好在与毓茂共事二十年，相交甚深，自然不会计较的。如若碍读者，那就索性丢弃它，径直去读原著吧。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于沈阳

目 录

序

高擎洲

第一辑：文化先驱的性格

- 伟大文化先驱的足迹……………（ 1 ）
郭沫若爱国主义的时代特点……………（ 55 ）
郭沫若的性格与风格……………（ 73 ）

第二辑：《女神》与《天狗》

开创一代诗风

——论《女神》在新诗发展中的地位

- ……………（ 85 ）
郭沫若与泛神论……………（ 96 ）
释《天狗》……………（ 114 ）

第三辑：郭沫若的戏剧和小说

现代史剧创作的奠基者

——郭沫若历史剧综论……………（ 121 ）

略论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成就……………（ 155 ）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试论郭沫若历史剧的“反秦”问题

..... (169)

郭沫若关于史剧创作的理论..... (180)

谈历史剧《蔡文姬》的历史真实性..... (190)

郭沫若的小说创作综论..... (200)

论郭沫若小说的时代特征..... (231)

论郭沫若小说的艺术开创作用..... (245)

郭沫若早期小说的心理描写

与精神分析学..... (259)

展现历史风云的画卷

——试论郭沫若的传记文学..... (266)

第四辑：郭沫若的友情

郭沫若与周恩来..... (279)

郭沫若和鲁迅..... (291)

郭沫若与闻一多..... (302)

后 记

(320)

伟大文化先驱的足迹

一

郭沫若（1892——1978）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社会活动家。乳名文豹，学名开贞，号尚武。后来取家乡沫水（大渡河）、若水（青衣江）二水之称，以为笔名沫若。其它笔名尚有鼎堂、麦克昂、易坎人、杜衍、石沱、谷人、李季、羊易之等。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一个地主家庭里。乐山，古代名为嘉州（后周宣政二年，公元579年），是古老的文化名城。旧府署城北临海棠山麓，因而历史上也把这里叫做“海棠香国”。这里三江相汇（大渡河、青衣江、岷江），风景优美。城北的凌云山、乌尤山，隔江相望，苍翠秀丽。凌云山的大佛石像，不仅是我国的最大佛像，也是东方最大的佛像，高九十多米，唐代海通和尚集资开凿，前后历时九十年始完工。时人谓“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气派雄伟，古今无两，为乐山增添壮观景色。历代许多著名的诗人作家，都曾在他们的诗文中赞美过乐山（嘉州）。如唐代的王勃、李白、杜甫、岑参、薛涛；宋代的苏轼、苏辙、黄庭坚、宋

祁、陆游；明代的杨慎、杨基、费密、汤显祖；清代的王士禛、张瑞、汪中洋、郑成基、袁文藻、朱盛、王元盛、李调元、赵熙，等等。李白在《峨嵋山月》中说：“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所谓“平羌”，就是乐山。宋代的苏轼，也曾在此游览，至今在凌云山尚有一座所谓“东坡楼”，相传是苏轼当年读书写字之处。郭沫若《忆嘉州》诗云：“海棠香国荔枝湾，苏子当年寓此间，云外读书声已歇，空余楼阁对嵋山。”在《题湛江西湖苏公亭》中说，“吾乡古嘉州，尚有苏子读书楼”。苏轼在《送张嘉州》中说：

少年不愿万户侯，
亦不愿识韩荆州；
颇愿身为汉嘉守，
戴酒时作凌云游。

郭沫若也多次在诗文中讴歌乐山风景的秀丽。他在《乐山的 风物与变迁》中说：“凌云山和乌尤山，……不仅风韵清幽，而且气派伟大，与庭园式的杭州比起来，别有风味。”他在《少年时代》中引用清代大诗人王士禛（渔洋）的话说，“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后来（1941）在《题傅抱石画山水小幅》诗文中说“天下山水在蜀中，渔洋此语非讹空”。（郭老实际误记了，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蜀道驿程记 十一》王渔洋并无此语。语出宋邵博之《清音亭记》：“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州之胜曰凌云寺”）郭沫若的出生地沙湾镇，距离乐山城七十五里，座落在大渡河岸边，紧傍着峨嵋第二峰绥山。绥山像一堵大屏风，把西边的大峨山隔断了，远远望去，大峨山只露出一点头顶，好像对沙湾行着注目礼。尤其是清晨时光，岚烟雾霭，空空濛濛。正如郭沫若描述的，对人们“保持着它的神秘性”。（《峨嵋山下》）而奔腾咆哮的大渡河，雄伟壮观，惊心动魄，培

育着这里人们热情奔放的性情。沙湾人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来形容自己的家乡，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就曾刻了“家在峨嵋画里”的图章。显然，景色如画的故乡自然环境，对郭沫若性格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郭沫若的祖籍是福建。他在《少年时代》中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小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1781年郭沫若的祖先郭有元从福建迁入四川，郭沫若曾祖郭贤琳是入蜀后的第三代。郭贤琳共生四男九女，他的次子郭明德就是郭沫若的祖父。郭明德生四男，其三子郭朝沛就是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的三个兄弟是郭朝瀚、郭朝瀛、郭朝圻。郭沫若父亲有四男四女。郭朝瀚有两子，郭朝瀛亦为两子，郭朝圻则只有一子。郭沫若虽然是父亲的第三子但在叔伯兄弟的大排行中是第八，所以，郭沫若被父辈们呼为“八儿”。

郭沫若自幼受到母亲的文学启蒙和教育，母亲对他的影响很深。他说：“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我决定性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沸羹集》，《如何研究诗歌和文艺》）还说：“假使我也算得个诗人，那个遗传分子确也是从我母亲来的了。”（《三叶集》）郭沫若母亲叫杜邀贞。她父亲杜琢章原是清朝贵州黄平州的州官。贵州苗民起义，攻破了黄平城池，杜琢章见大势已去遂全家自杀，只留下当时还不满一岁的郭沫若母亲杜邀贞，托给乳母刘氏逃出黄平。刘氏在云南、贵州民间流亡了三年，才回到四川，然后把三岁的杜邀贞寄托在外祖父家里，过着寄人篱下的困苦生活。但她天赋异常聪明，靠自学能够读书写字，熟悉唐诗等中国古典文学，因而在郭沫若发蒙以前，这位熟悉中国古典文学的母亲就教他念诗。他说，母亲“对于诗歌有偏爱，在摇篮时代一定给我们唱过催眠歌，当然不记忆了。但在我自己有记忆的二三岁时她已经把唐人绝句教我暗诵，能诵得琅琅上口。这，我相信是我受的诗教的第一课。”（《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

《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31页)

1897年春天，郭沫若才四岁半就开始上学了，他进的是家塾“绥山馆”。塾师沈焕章先生是一位廪生，他学识渊博，忠于职守，为人正直善良，他按照旧教育的章法，严格要求学生，郭沫若在塾师的教导下，白天读经，晚上读诗。在短短的几年里，郭沫若熟读了《易经》、《书经》、《周礼》等古书，虽然当时郭沫若对读经不如读诗有兴味，但这些古书对郭沫若很有益处，给他打下牢固的国学基础，对日后他在史学和文学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具有重要作用。他自己说：

“幼时我自己所受的教育，完全是旧式的。读的是四书、五经，虽然并不能全懂，然而也并不是全不懂。像《诗经》那种韵语，在五经中是最容易上口的。四书也并不怎么深奥。这些古书的熟读，它的唯一的好处，便是教人能接近一些古代的文艺。

(《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

当然，比较起来，郭沫若小时更喜欢读唐诗、《千家诗》和《诗品》之类，郭沫若六、七岁时就开始作对子和试帖诗了。他在《批评与梦》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记得大概是在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家塾后去钓了鱼回来，先生评字的时候，在纸背上戏写了‘钓鱼’两个字，便向我们索对。我在那时才看了《杨香打虎》的木人戏不久，我便突口叫出‘打虎’。先生竟拍案叫绝，倒把我吓了一跳。我有个从兄比我大三岁，他想了半天才想出‘捉蝶’，先生说勉强可对。后来先生竟向我父亲称赞我，说：‘此子出口不凡，将来必成大器。’”郭沫若当时写的诗现在能收集到的已结集出版，即乐山市文管所编的《郭沫若少年诗稿》。如郭沫若十三岁时写的《村居即景》：

闲居无所事，散步宅田前。

屋角炊烟起，山腰浓雾眠。

牧童横竹笛，村媪卖花钿。

野鸟相呼急，双双浴水边。

又如《早起》：

早起临轩满望愁，

小园寒雀声啁啾。

无端一夜风和雪，

忍使峨眉白了头。

这些诗尽管还带有童年的稚气，也说不上有什么深远的含义，但却表现了郭沫若从小就富有艺术想象力和细心观察生活和描述生活的本领，已经显露出他写诗的才华。

除母亲外，大哥郭开文也是给郭沫若影响很深的人。郭开文号橙坞，天资聪明，性格浪漫，诗词、篆刻、书法、绘画都很精通，他在成都东文学堂学习后，去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到四川，曾先后任省交通部长，川边驻京代表，他从启蒙运动的文化先驱，后来堕落成腐败的官僚，但在他早期对郭沫若的影响还是积极的。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回忆说，大哥把“他在成都所接受的影响直接传到我们乡里来，放足会是他首先提倡的，我们家里人在乡中解放得最早，就是五十多岁的我们的母亲，那时候也把脚解放了。女子素来是不读书的，我们的妹子和侄女也都跟着沈先生读起书来。这些不消说都是他的主张。”同时，郭橙坞还影响了塾师沈焕章，使家塾的教学内容发生了变革，开始采用一些新式教本作教材。郭沫若回忆说：“焕章师改革教授法，于四书五经及唐宋诗文之外讲授新学课本及笔算数学。”（郭沫若《五十周年简谱》，重庆《中苏文化》半月刊1941年11月第九卷第2、3期合刊）这些新教材就是当时“上海出版的蒙学教课书，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等等，差不多现在中学堂所有的科目都有。我们家塾里使用这些来做课本，有一部《笔